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透视中日文化差异及其根源

申秀逸*

【摘要】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取决于其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文化和国情的不同，各国采取的防疫措施也大相径庭。进入后疫情时期，很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源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也意识到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日本虽然也是受儒家文化所辐射的国家，但在疫情期间出现的中日文化差异却体现了其不同于中国的文化特质。本课题旨在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跨文化的视角分析中日文化差异的根源，进而探讨后疫情时代国家间的跨越价值取向差异的理解与合作。

【关键词】 新冠疫情；文化差异；耻文化；价值取向

一、序言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从2019年年底开始流行，被公认为是百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世界规模的传染病，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且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特征。此次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

疫情初期，由于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知不足，加之各国的国情不同，不仅抗疫政策和措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也显现了出来，并引发了东西方面的文化冲突。例如，疫情中针对戴不戴口罩发生的“口罩之争”，以及对英国人“群体免疫”政策的质疑^[1]等等。本文主要从中日两国的文化冲突现象入手，并以传统文化为依据，分析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以及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现象一：核酸试剂风波

2020年3月，随着日本的新冠疫情日益严峻，软银集团董事长兼社长孙正义于10日傍晚，在推特上针对新冠肺炎发表了“看看能不能作出贡献”等言论，并于11日表明了“想无偿提供简易PCR检查，先提供100万人份”的意向。但是，这“会引起医疗机关的混乱”“自以为是”等否定意见纷纷而至。对此，他又在推特上说：“评价不好，还是算了吧。”^[2]约2小时后便撤回了之前那个捐赠意向的推特。3月13日，孙正义又在推特上发文称，“捐100万枚口罩给护理机构和私

* 作者：申秀逸(1972—)，女，中国河北，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语言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2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Y2022024)阶段性成果。

人诊所的医生”。不过，对孙正义的此举，日本民众又是众说纷纭。日本民众这回的担心在于“口罩从哪里买？你买走了，一般民众不就买不到了吗！”^[3]

现象二：口罩风波

此处提到的口罩风波则是关于疫情中中日两国在口罩馈赠上产生的文化差异。

2020年2月，在中国新冠疫情正处于水深火热期间，爱知县丰川市向友好城市中国无锡市新吴区提供了4500枚口罩并附上了“加油！”的话语。之后，爱知县内相继确认感染者，丰川市也出现了感染者。丰川市政府虽然储备了口罩，但5月末储备品就会用尽。竹本市长说：“听说无锡市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如果方便的话，希望这次能提供给丰川市。”^[4]

2020年3月23日，丰川市市长的求助信息一经发出，无锡新吴区便立即筹集了5万枚口罩进行回赠，在口罩的外包装上还写着：“一衣带水，源远流长；隔海相望，樱花满开；众志成城，战疫必胜。”^[5]

然而，大多数日本人竟然认为竹本幸夫市长的做法丢人，有的日本人甚至在网上指责他是“国贼”，其行为简直是“国耻”。日本人的这种反应着实也令中国人震惊。

现象三：疫情初期防疫策略上的迥异

2020年年初，中国在疫情初期，采取了严格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政策，甚至不惜经济代价采取“封城”等措施，而日本政府在疫情初期的2月发布的抗疫“基本方针”是：重症收治，轻症居家！必要时实施较大范围的外出自肃^[6]，并没有采取强制手段控制疫情。

对于以上日本在疫情中出现的三个现象，许多中国人很是费解，日本民众为何认为孙正义捐赠核酸测试剂就是“毁灭日本”？为何称竹本幸夫索要口罩的行为为“国耻”？为何日本政府面对重大危机时却一味要求国民“自肃”？

接下来，试从日本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一下这些现象背后的日本人的行为及其价值取向。

二、日本文化的本质与价值观

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曾说过日本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哲学的民族。那么，日本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如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提出了“杂种文化论”^[7]，民族学家梅棹忠夫又提出了日本文化的“黑洞论”^[8]，而西方学者则将日本文化的本质定义为“中空论”。^[9]

文化的“杂种性”体现出文化上的包容与混合，文化的“黑洞”体现出了超常吸收能力，“中空”的本质是虚空的，也同样意味着可以做到容纳与吸收。虽然学者们用不同的术语指出了日本文化的本质，但他们指出的日本文化的特点具有共性，即具有容纳与吸收的能力。

那么，日本文化上的容纳与吸收的特点给日本人的思想及价值观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一）相对主义价值观

日本的民族精神结构中缺乏像西方的上帝和中国儒家的孔子那样的精神支柱与权威，所以不存在绝对的价值观，也“意味着理性的蒙昧，精神定力的不足，在错综复杂的生存竞争中，凭生存的本能行事，易随波逐流，狂奔暴走”。^[10]加之“中空文化”由于本质上的空虚，必然产生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而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道德律令、抽象的理论原则格格不入。正如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下简称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的那样：

在日本人的头脑中没有善恶对立的观念，他们不把人生看作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较量的舞台，而把人生看作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的。因此，相互之间要求自行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11]145}

这种没有绝对善与恶的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是日本人在自古以来的严峻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缺少一个判断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绝对标准。

（二）对“仁”的认知不同

虽然日本的文化具有容纳和吸收的特点，并且可以令自己随时处于吸收的状态，不过日本的吸收是有取舍地进行吸收。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并非全盘的吸收，而是有选择性的，甚至有的地方对儒家的教义进行了修改。

中国先哲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荀子·哀公》）可见，“载舟覆舟”的辩证思想揭示了君民关系的本质。《孟子》则更尖锐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民事不可缓也”，所以他提倡重民本，施仁政，“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仁者无敌，所以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君主不仁，百姓可以揭竿而起发动易姓革命。《礼记·礼运》中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可见，中国的“忠”“孝”的根本前提是“仁”。

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和终极价值全都落实于“仁”，“仁”居“五常”之首。它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原则，也是做人的最高道德原则。而日本则把对天皇的“忠”和对父母的“孝”都视为无条件的义务，却把“仁”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不仅没有崇高的地位，日语中的“行仁”或是“行仁义”甚至用来指无赖汉之间的德。因为基于“仁”来评价君主的做法与天皇制水火不相容。在“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国度里，天皇就是绝对的权威与价值，根本不需要什么“仁”。在日本封建时代，特别是江户时代的武家社会实行的是世袭制，也在本质上与“仁”

格格不入。所以说，日本没有真正认可中国的“忠”以及“仁”这种伦理道德。也就是说，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中忽略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

本质上是“中空”的日本文化体现出的是相对主义价值观，道德体系上又缺少了“仁”这个儒家思想核心要义，那么，日本人的文化特质以及行为准则又是什么呢？

三、从“耻文化”看中日文化差异

本尼迪克特认为，美国文化是以罪恶感为基调，而日本文化则是以耻辱感为基调。日本人的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一个人因受到公开嘲笑与槟斥，或者自以为受嘲笑而感到耻辱，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耻辱感都将成为强大的约束力。但要求有旁观者，至少是想象出来的旁观者。在本尼迪克特看来，“耻文化”是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罪文化”则是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11]160}

不过，这种有“旁观者”存在的，“需要外在约束力”的知耻与中国传统的“耻文化”大相径庭。

（一）中日耻感文化的差异

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曾对《论语》进行考证，发现“罪”一词只出现过三次，而“耻”一词不仅频繁出现，而且意义重大。对此他认为，孔子把“耻”作为内在的，并从内在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孟子的“礼义廉耻”四德思想也是立国的四大支柱，中国传统的“耻”是道德的根本。^[12]

并且，中国传统的“耻”文化强调“内省”而知耻，日本则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视为人生存在价值的核心，强调“外辱”而知耻。^[13]不仅如此，中国的“耻文化”不仅是“内省型”的，耻感意识也“是基于一定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而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求荣避辱之心，是人们珍惜、维护自身尊严而产生的一种情感意识”。^[14]

而日本人的确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是以耻辱感为原动力。^{[11]160}耻辱感在日本人生活中所占据的首要地位意味着每个人都注意公众对其行动的评判。特别注意时刻与自己所属的集体保持一致，并以背叛集体为耻。他们只需推测他人大概会下什么判断即可，然后以他人的判断为基准来确定自己的行动基准。即，只要对自己有利，言行随时可以根据外界的环境加以改变。

由此可见，虽然日本有貌似和中国相同的“耻文化”，但两国的“耻文化”在内涵上却截然不同。日本道德理念中离开了“仁”的规约，没有普遍的是非、善恶标准，“耻”就是一种通过外在的约束，注重他人评判的他律型的、“外辱型”的耻感意识。日本人的羞耻心并不是通过内省以达到人格的升华为目的，而是以避免受辱为目的。

在日本人看来，不能按照明确规定的善行标准来行事，不能在种种义务间保

持平衡，不能预见偶然事故，暴露自己的缺点，承认失败，流露感情以及给别人添麻烦等等就是耻辱。

接下来，通过具体现象进一步分析一下日本人对耻的认识。

（二）日本人视给人添麻烦为耻

明明通过核酸检测最能掌握感染人数，但孙正义却受到国民抨击，于是他就立刻改成捐赠口罩了。我们不难看出他也是个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及他人评判的人。明明捐赠核酸试剂的行为是一种正义之举，却为何遭到国民的抨击？

在网络上的各种批评声中，甚至还有“上升的数字会引起恐慌”“不检测就不会死，你是想发动战争吗！？”这样的极端言论。在一些日本人看来，比起感染新冠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给家人、同事、医疗机构甚至是国家添麻烦，产生的危害更大。

在日本人看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打扰别人是做一切事情的逻辑前提和普遍有效的行为规范，并内化为心中的道德追求。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中，从小便被教育“不应该麻烦他人”，强调做好自己的本分，尽量不给他人造成困扰。因此，从那些批判孙正义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担心的是感染了新冠被他人得知，小到对自己的家人和工作产生了影响，大到会给国家的医疗机构增添负担，而日本本身就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医疗机构本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感染者数目的增加也会使日本的国际形象受损。所以感染了新冠被发现，就会意味着给他人、给社会、给国家增添了麻烦，再加之日本正处于2020年7月24日东京奥运会是否能如期举办的关键时期，此时若通过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发现大量感染者，不仅会造成医疗系统的崩溃，也会影响奥运会的如期举行，这会关系到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问题。因此，此时孙正义的捐赠行为在日本国民看来，就是一种会令日本人及日本出丑的行为，这对日本国民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才会对PCR检查表现出令其他国家震惊的抵抗态度。

日本人这种出于不给他人添麻烦的精神可以说是日本的“耻文化”的体现。即，以给别人添麻烦为耻。进一步说，是以受他人指责为大耻。

而在口罩捐赠事件中，从“区区4500枚口罩还要要回来真是丢脸”这样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要回口罩本身就是件丢脸的事，因此遭到了批判。

可见，日本传统的“耻感文化”早已经渗透到了日本国民生活中，甚至日本政府乃至日本国民在日常的生活中，也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西方人常以不触犯“原罪”作为他们言行的准则，而日本则是以丢脸与否来衡量他们言行的是与非。也就是说，西方人在乎的是上帝的眼神，而日本人在意的则是他人的眼光。所以，当日本人在面临威胁集体的群体性危机时，都会尽量做好自己的本分，比如响应政府的号召，不给政府添乱。

（三）日本“耻文化”下的“恩”是一种债

日本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期时，面对中国的支援与帮助，众多的日本

人却发表了诸如“觉得这不是在感恩，是要‘施恩图报’‘要人感恩’”等言论，从中可以看出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内心深处对于中国的馈赠不仅没有感恩，反而感到了一种压力。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国人所崇尚的报恩意识，也是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报恩意识”已上升到社会责任、人伦关系的高度。疫情期间，面对来自日本的援助，哪怕是“区区4500枚口罩”，也是雪中送炭，对此中国人以十倍数量的口罩又回赠给日本的做法正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思想的完美体现。

而日本人则认为“恩”是一种债，必须偿还，并且一个人所欠的恩情债并不是德行，报答才是德行。德始于他积极地献身于报恩行为之时。并且，日本人还把对“恩”的报答分成两种。一种报答在量和持续时间上是无限的，称为义务，是无条件的，主要分为对天皇的恩以忠来报答，对父母的恩以孝来报答。另一种报答在量上与“恩”是相等的，并有特定的期限。^{[11]90-92}

相对于义务，日本还有个词叫“义理”。“义理”是日本独特的道德义务范畴。“义理”指的是：“正当的道理；人应遵循的道路；为向社会谢罪而不情愿做的某种事”。因此“偿还义理”充满不愉快、不情愿和不得已。“义理”也有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社会的义理”即“报答性义理”，“报答性义理”是对对等关系的人履行的报恩的责任，强调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履行“义理”。如果受恩不报，就会被称为“不知义理”的人，他将在世人面前蒙受耻辱。并且“迫于义理”的人往往被迫偿还随着时间而增长的人情债。另一个则是“对名誉的义理”，是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11]106-109}

也就是说，日本人把对“皇恩”及“父母恩”这种无限期的报答视为义务，并不带有“不情愿”的色彩，而对除此之外的有特定期限的、也是等量的对“恩”报答视为“义理”，并带有“不情愿”的色彩，因为这是出于公众舆论的压力。

所以，蒙受他人的恩情时，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是感激之情，日本人则感到压力。在日本人看来，施恩惠于人诚然是一件好事，但必须预见并注意到受恩惠者大概会感到欠下了“恩情债”，因此施恩时也需慎重。并且日本人在接受恩惠时，尽可能地及时还礼，以免恩情债随时间而加重。而且还礼时还要注意与对方的“恩惠”相当，做到不要让对方感到压力。

在疫情中，当日本收到了是本国十倍的口罩时，虽然有不少日本人表达了感谢之意，但从日本人的评论中不难发现，大多数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慷慨之举并没有从内心坦然接受，而是感到了沉重的债务压力。特别是对于丰川市市长竹本幸夫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愤怒：首先，指责他缺乏作为市长的领导能力，没有预见本国的危机，先将口罩捐给了中国，“不能预见偶然事故，就是耻辱（‘耻’）”。再者，他将已经赠给中国的口罩再要回的做法令日本人感到丢脸。最甚的是他作为地方领导者还让日本人背负上了十倍的恩情债。这就是为何日本网民说中国回赠十倍的口罩是在“施恩”的缘由。

（四）“自重”是为了免于耻辱

日本人之所以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是觉得给别人添了麻烦，就是受了他人的恩惠。因为“恩”是一种债务，必须偿还。所以一个人管好自己的事情，那么也就意味着“自重（尊重自己）”，不给他人添麻烦。

在日本，“自重”从字面上说是“庄重的自我”。当一个人说，“你必须自重”时，那意思是“你必须精明地估计包含在这一情形中的一切因子，不做任何会引起批评或减少你成功机会的事情”。^[11]¹⁵⁷⁻¹⁵⁹

作为自尊心很强的日本人，要做到“自重”，就要做到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即“自肃”。这也是对名誉的“义理”的一部分。反之，没有履行对名誉的“义理”，则成为“不知义理”的人，也将在世人面前蒙受耻辱。

那么，以“耻文化”为基调的日本和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中国，因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导致两国在疫情初期防疫策略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2020年3月28日，日本政府发布的新冠对策的基本方针中指出：政府认识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对策是危机管理上的重大课题，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安全，到目前为止，在边境防控对策、防止扩散、医疗提供等方面一直以来竭尽全力应对。并明确声明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以高龄者为首，控制感染人数以及维持医疗提供体制和社会功能是很重要的。^[15]并针对如何应对新冠以及如何防止疫情蔓延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

主要的基本对策是：做到严防“三密”（即密闭空间、密集场所、密切接触），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戴口罩”“勤洗手，保持手指卫生”以及“通风换气”等事项。^[16]

不过，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2020年4月6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东京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增速为每日15.2%，从上周开始一直处于“爆炸式增长”的边缘，那时就应该进一步限制民众活动，采取强力应对措施，否则今后的疫情肯定会超过政府的可控范围。然而，安倍内阁一直采取了“把经济放在首位”的方针，在处理疫情时仍在思考如何避免经济衰退。甚至在东京面临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量大爆发的时候，自民党还在讨论疫情结束之后如何刺激旅游和餐饮消费。^[17]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以城市为中心扩大，日本医疗体系面临着随时崩溃的风险，2020年4月7日傍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才宣布，东京、神奈川、埼玉、千叶、大阪、兵库、福冈七个都府县实施紧急状态。不过，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不同于“封城”。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后，政府要求民众“外出自肃”，并提出“虽然没有强制力但有努力（自肃）的义务”。针对外出，政府规定都道府县的知事可以要求居民在规定时间内和地区，对非必要非紧急的外出进行“自肃”。到医疗机构就医、购买食品、上班通勤等维持生活必要的情况除外。虽然政府限制外出只是“要求”，没有强制力，但却提出国民有义务努力配合对策。为了防止感染扩大，都道府县知事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学校停课、限制公共设施的使用以及对举办活动提

出“自肃”的要求。对于不服从“要求”的设施等，都道府县知事可以进行“指示”。并且知事会将被“指示”的设施名称在主页上“公布”。这个“公布”并不是惩罚的意思，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设施已经关闭，防止生活混乱。^[18]

在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是“自肃（自我约束）”“义务”和“公布”。这三个词充分地体现出了日本政府的抗疫对策和日本传统的“耻文化”。首先提出民众的“自肃”是“义务”。言外之意，不“自肃”就是没有履行义务，因没有做到“自肃”“自重”而陷入风险或困境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是可耻行为。并且“耻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需要有第三者知情。所以日本政府对那些没有履行义务者将采取“公布”的形式，这就是堂而皇之地让那些没有履行“自肃”义务的人以及组织公开出丑，接受舆论的压力。迫使违规的人去履行对社会的“义理”。在对策中虽然明确地说“公布”不是惩罚，但对于“耻文化”下的民众来说，受到公众嘲笑而感到耻辱，才是最难堪的事情。所以，日本政府的这种“自肃”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日本特有的“耻文化”，没有比这种“公布”再有效的惩罚了。

日本人的“自肃”或者说“自重”是为了不出丑。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四》）不同，“克己”是一种修养，既包括克制私欲，又包括提高理性思维能力。而“礼”则是社会的规范。孔子认为，“克己”的修养功夫和对礼制的恢复可以使“天下归仁”。“仁”才是作为人的最高道德原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第四》）。“仁”，通俗地说，就是同情人，爱惜人，关心人，让天下所有的人都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幼有所安，体现的是中国式的人文关怀。

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最先爆发，中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采取了最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最为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且充分肯定了政府在这次疫情中工作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 21 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我们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督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我们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我们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坚持中西医结合，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最大程度

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习总书记还指出：“全总体防控策略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推动防控工作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健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19]

中国正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民“克己”配合，才取得了抗疫的成功。随着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采取“躺平”的消极应对，而中国依然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2022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仍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20]。

从习总书记的讲话以及中国的防控及救助政策到现今的“动态清零”政策可以看出，政府在疫情中起到了绝对主导地位，为疫情的防控提供了政策、组织、资金和人员等各方面的保障。“生命至上”体现了民本思想，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也是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与将经济放在首位的欧美各国“消极抗疫”以及日本的“自肃”防控相比，中国政府在疫情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疫情防控最鲜明的特色。

不仅如此，疫情中经常出现的如“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命运与共”“尊重科学”等字眼也都是我们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准体现。

放眼全球，能够统领14亿人口，戮力同心抗击疫情，并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道德经》第六十章）的国家，唯有中国。中国走的就是一条依据国情、“以人为本”的重“仁”之“道”。

中华文化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扶贫济困”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如今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又结合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及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2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

义。”^[22]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就在于它始终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并随着世界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焕发新的活力。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是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四、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展望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对中日关系整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中日之间既有互赠口罩等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温情时刻，也有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以及疫情应对策略上的不同。疫情期间，中日两国的携手合作，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有助于两国今后关系的改善。然而疫情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又不得不让人思考今后两国在后疫情时代以及今后面对重大危机时的应对。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有必要加以关注。

（一）加强中日友好城市间等民间的交流与互助，促进中日两国民意的改善

中日两国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发展得并不是一帆风顺，两国民意也不尽如人意，民间的对立及厌恶情绪没有得到改善。^[23]通过此次疫情可以发现，虽然中日民间交流在疫情冲击下明显受阻，但疫情中中日两国友好城市间的互助为抗击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民间交流也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如，“云对话、云展览、云推介等成为中日民间交流的新形式，公共卫生、医疗康养、疫苗研发等医疗健康领域议题显著升温”。^[24]

基于这种良好的势头，今后加强两国民间交流，改善敌对情绪，可以有助于减少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误解与偏见，进而加深相互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和平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培养世界眼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离不开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25]

因此，认同国家在文化上的特殊性，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交流，有助于减少文化冲突。虽然日本也处于儒家思想的文化圈，但从“耻感文化”的差异上就可以看出日本与中国并不是“同文同种”。所以，需要拥有开放兼容的世界眼光，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从而从更高层面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更能展开平等的、包容的交流、理解与合作。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度阐释中国价值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奉行的外交政策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3]

面对此次的严重疫情，中国在全球抗疫中的责任与担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行动。可是，从疫情中的种种文化差异可以看出，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并没有被世界真正地理解，因此，仍需要坚持不懈地向世界阐释中国的价值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26]

当今世界，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软实力包含的内容很多，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民族素质、国民精神等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核”，离开这个“基本内核”，文化软实力就等于失去了灵魂。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27]，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会对减少文化冲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中日两国未来的课题

此次疫情，西方标榜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疫情中暴露了他们本国利益至上的伪善面目。西方主流国家虽然意识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但同时他们又担心过度依赖中国会促使中国的快速崛起。于是他们对中国企业进行疯狂的打压，甚至还采取了“反全球化”的做法。日本虽然身处亚洲，属于儒家文化圈，但日本依然是位列资本主义阵营，深受美英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影响，受中美贸易战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大的影响，日本国内也开始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经济会带来“负面效应”，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出现了“撤出中国”“与中国脱钩”的动向。如，任天堂等一些知名日本企业正在从中国撤回或转向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国家。日本经济产业省对回归日本的企业提供的“针对供应链对策的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费补助金”^[28]的对象中，就包含了不少从中国撤退的企业。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无疑会对中日关系以及中日经济的合作带来不良影响。

疫情结束后，中日关系乃至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都将面临重大挑战。面对未来，期望未来中日两国通过深入的文化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尽可能减少文化冲突带来的误解与偏见，促进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其他领域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浚、周弘. 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基于英美、德国和中国新冠疫情初期应对政

- 策的比较与思考[J].欧洲研究, 2021(2):3.
- [2] 孫正義氏「評判悪いからやめようかな」…PCR検査「無償提供を」2時間後に撤回. 読売新聞. <https://www.yomiuri.co.jp/economy/20200311-OYT1T50198/>
- [3] 推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iJRXyBIDU>.
- [4] 頑張れ！送ったマスク「見込み甘かった、できれば…」. 朝日新聞.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3S6T8GN3SOBJB003.html>.
- [5] 曾捐来 4500 只口罩的日本友城告急, 无锡 10 倍回赠. 观察者网. https://m.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3_25_543665.shtml
- [6] 日本科学研究创新信息平台.《客观日本》. https://www.keguanjp.com/kgjp_keji/kgjp_kj_smkx/pt20200225143011.html
- [7] (日)加藤周一. 加藤周一セレクシヨ 5 現代の日本文化と社会[M]. 東京:平凡社, 2009(7):37-64.
- [8] (日)梅棹忠夫. 日本とは何か 近代日本文明の形成と発展[M]. 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86.
- [9] (法)罗兰·巴尔特. 符号帝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 [10] 李兆忠. 曖昧の日本人[M]. 北京:九州出版社, 1998:245.
- [1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孙志民等译. 菊与刀[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5.
- [12] 森三树三郎、王顺洪. 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J]. 中日文化研究, 1995(02):118-122.
- [13] 孙庆忠等. 东方传统耻感文化下的中日差异[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9):77-81.
- [14] 台秀珍. 耻感文化的内涵及大学生耻感意识的培养[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9(9):37.
- [15] 新冠肺炎对策. https://corona.go.jp/news/news_20200411_53.html.
- [16]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基本的対処方針に基づく対応. <https://corona.go.jp/emergency/>.
- [17] “日本緊急事態宣言“晚了一周”专家:不具强制力 寄望国民“耻文化”起作用”. 环球网,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0/0407/c35421-31663547.html>.
- [18] 緊急事態宣言 出たらどうなる?(生活・医療・交通). NHK.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406/k10012370561000.html>
- [19]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0-9-8,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9/08/c_1126467958.htm.
- [20] 国家卫健委: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央视网. <https://news.cctv.com/2022/03/18/ARTI9hRwykqsRDPSGBy6lYsz220318.shtml>
- [2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新华网.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23/c64387-23924110.html>.
- [2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7/15/c_1127658385.htm.

- [23] 高洪. 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J],日本学刊,2020(2):27-32.
- [24] 《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21)》. 《客观日本》主页.
https://www.keguanjp.com/kgjp_people/pt20211202000014.html.
- [25] 习近平专题报道:守护中华文脉,习近平这样说.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20-01/25/c_1125500495.htm.
- [2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ldhd/2014-02/25/content_2621669.htm.
- [27]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770.html>
- [28] 「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対策のための国内投資促進事業費補助金」の公募について. 経済産業省. <https://www.meti.go.jp/information/publicoffer/kobo/2020/k200522001.html>.

Study of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Its roo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ghting COVID-19

Shen Xiuyi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a country depends on its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se aspects,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seen wildly different measures taken by countrie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many countries are beginning to recognize that China's success in fighting COVID-19 stems from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and even ideology in influencing people's behavior. Although Japan is also a countr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the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epidemic reflects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Chin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analyze the root cause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so as to explore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of overcoming value orient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Key words: ~~COVID-19; Cultural conflict; Shame culture; Value orientation;~~

「新型コロナとの戦い」から見た中日文化の違い
とその根源
申秀逸

【要旨】 国家の主流的価値観の形成はその国の歴史文化と現実の国情によって決定され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発生期間中、文化と国情が異なるため、世界各国の取った防疫措置も大いに違っていた。ポストコロナ禍の時期に入り、

多くの国が中国の COVID-19 との戦いの成功は中国文化の深い歴史的背景に由来し、文化ないしイデオロギーが人々の行動に及ぼす影響が極めて重要であることを認識し始めている。日本も儒家の文化圏にある国家だが、新型コロナとの戦いの中で起きた文化的差異は日本の中国の文化と異なる特質を表している。本研究の目的は、比較文化の研究手法と異文化の視点を用いて、中日文化差異の根源を分析し、さらに、ポストコロナ禍に入り、価値観の相違を越えた国家間の理解と協力を検討すること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コロナ禍；文化的衝突；恥文化；価値志向